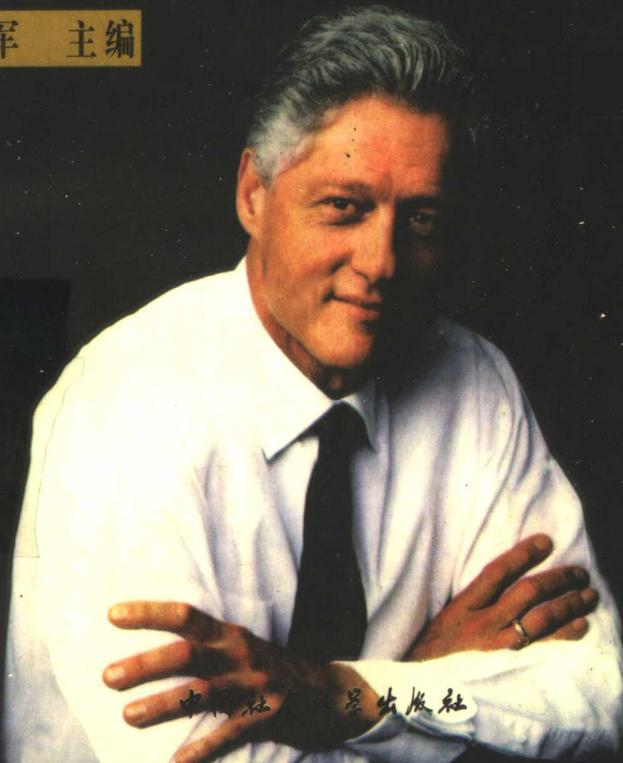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 克林顿治下的美国

牛军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华美国学丛书

# 克林顿治下的美国

牛军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牛军主编 .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0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2325-X

I . 克… II . 牛… III . 政策-研究-美国-文集 IV . D771.  
2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62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328 千字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23.00 元

## 前　　言

编辑这本论文集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更深入和广泛地了解冷战后美国内外政策的变化与特点，并推动学术界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内外政策的研究。

从尽可能多的方面研究和揭示冷战后、特别是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美国内外政策，是编者的一个重要宗旨。目前收入的 20 篇论文，大致涵盖了美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

论文集分为外交篇与内政篇，主要是为了方便编辑和阅读。实际上一些课题的研究是很难区分属于哪一类的，如美国经济的研究。这种简单的分类也反映出这样的问题，即对涉及外交的问题研究的较多，而且一般地说分量也重一些。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编者有意使然，它大致反映了目前中国美国研究的实际状况，即参与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多数人的兴趣是在美国的外交而非内政。这是很正常的和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学术研究和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的角度看，如果对美国政治、社会、文化、宗教及经济等的研究长期滞后，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对美国外交的研究也会因此而难以深入下去。相信未来的研究发展一定会逐渐弥补今日之不足。

这本论文集收入的论文大部分完成于克林顿的第一任期内，只有四篇跨越到克林顿第二任期第一年的前半年。所以严格地说，论文集包括的主要是对克林顿第一任期的内外政策的研究成果。

这本论文集最初的设计是由张也白先生进行的，在整个编辑过

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出版则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 者

1997年11月

# 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战略(代序)

王 绅 思

冷战后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也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各大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之一。本文拟从近年来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出发，提出衡量美国世界地位的若干标准，并在对美国的实力地位作出评估的基础上，判断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方向。

## 一 美国经济实力再评估

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著作《大国的兴衰》(1987年)为开端，美国学术界在80年代末对美国兴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中国，讨论美国国际地位最集中的时期是1990—1992年。在中国研究者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的地位已经相对衰落。有人进而提出，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持续下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美、日、欧的经济实力在本世纪末即会“逐渐趋平”。也有人认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盛时期”相比，其实力和地位相对削弱或衰落固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说它从此将不可避免地一直衰落下去，则根据不足。

90年代初，得出美国正在衰落结论的首要根据，是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高于美国，美国同其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差距正在缩小。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一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自1991年3月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已经实现

70 多个月的持续增长，远远超出了战后平均连续增长 50 个月的界限。以目前美国经济强劲的势头判断，这一轮经济扩张有望持续到本世纪末。美国经济增长率在 1993—1994 年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1995—1996 年基本持平。在 1995、1996、1997 三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2.0%、2.4% 和 2.2%，超过日本的 0.9%、3.6% 和 1.6% 以及德国的 1.9%、1.1% 和 2.2%（1997 年均为预测数字）。<sup>[1]</sup> 90 年代初许多观察者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美国同日本等国相比，在许多方面丧失了经济竞争的优势。论据包括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下降，在汽车、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和一些高技术产业竞争中不敌日本，外国在美投资迅速增加，外国银行进一步打入美国金融市场，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和银行形成对美国越来越大的挑战，等等。国际竞争力不像经济增长率那样容易比较，但是近年来美国同日本和欧洲相比竞争力有所上升，则是许多专家的共识。美国再次在世界市场上夺回汽车、半导体等产量的桂冠。美国从 1994 年开始，连续三年得到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冠军称号。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共同组织的年度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1996 年美国总分排名第一，日本屈居第四（新加坡和香港分别列第二、三位）；美国在国内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政府作用、国际化、科学技术开发等指标上都高于日本，但在企业管理、国民素质方面低于日本。<sup>[2]</sup>

自克林顿上台以后，扭转了里根—布什时期联邦预算赤字直线上升的局面，推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以削减赤字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政策。<sup>[3]</sup> 联邦预算赤字从 1992 年的 2903 亿美元逐年下降到 1995 年的 1638 亿美元，<sup>[4]</sup> 1996 年又进一步缩减到 1073 亿美元，<sup>[5]</sup> 已不到 1992 年财政赤字的 40%。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 1991 年的 6% 降到 1996 年底的 2% 以下，接近 1979 年以来的最低点。1995 年底到 1996 年初，白宫同国会虽然爆发了“预算战”，但在平衡预算的总目标上立场趋于接近，双方如果能在军费和裁减

福利开支方面达成妥协，将有希望在下世纪初基本解决预算平衡问题。

1995—1997 年美国失业率只有 5.4% 左右，比起 1992 年 7.5% 的失业率有大幅度下降，更大大低于同期欧盟 11% 左右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的充分就业状态。日本的失业率虽然只有 3% 左右，但对实行终身雇用制的日本经济而言已经是危机状态。<sup>[6]</sup>近来美元汇率、消费者信心指数、道一琼斯工业指数、劳动生产率、公司利润率等都处于高指标，也是美国经济良性运转的标志。自 1991 年以来，美国股市行情扶摇直上，1996 年美国的股票市场是近 20 年来最火爆的。<sup>[7]</sup>

美国经济在上述方面的发展变化，是 90 年代初期许多专家未能充分估计到的。同时，围绕着关系到如何评价美国兴衰的的经济现象，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 第一，关于巨额贸易逆差。

自 80 年代初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逐步扩大，1990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到 1995 年已达 1587 亿美元。<sup>[8]</sup>有些学者指出，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非像表面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严重。首先，所谓贸易逆差指的是有形商品贸易的进出口差额，而美国服务贸易的巨额顺差至少可以抵消其有形商品贸易逆差的一部分。自 1970 年以来，美国服务贸易一直保持盈余，1986 年服务贸易顺差已达 103 亿美元，到 1995 年更达 630 亿美元。<sup>[9]</sup>服务贸易在当代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而美国率先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技术、信息、金融、保险、运输等服务贸易领域稳居世界第一，因此仅根据商品贸易差额来判断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全面的。其次，美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海外直接生产、就地销售的收入没有完整地反映在贸易统计中。<sup>[10]</sup>此外，美国在官方统计中有夸大贸易逆差的倾向，这在中美贸易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sup>[11]</sup>

### 第二，关于财政赤字和债务。

虽然联邦预算赤字近年来呈直线下降趋势，但美国内外债仍在增加。联邦政府的公债从 1990 年的 32333 亿美元跃升到 1995 年的 49740 亿美元，<sup>[12]</sup> 增幅达 54%。1990 年底美国外债为 2948 亿美元，到 1993 年底跃至 5558 亿美元。<sup>[13]</sup> 美国 80 年代末戴上的“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帽子，到 90 年代末也摘不掉。

有论者认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基本波动于 2%—6% 之间，同西方七国 4% 上下的平均比率基本持平，因此不能说明美国经济衰落，而且赤字财政是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经济危机的结果。<sup>[14]</sup> 从传统观点看，长期债台高筑应导致投资不足，消费者信心下降，外国投资者撤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加剧了美国的外债负担，使美国政府必须用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用于支付外债利息。但有的学者指出，近年来美国并没有出现债务危机，国债销售看好，海内外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十足，美国对外投资特别是私人资金的投入增长迅速。90 年代，美国资金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取代日本和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日本近年来却投资不足。<sup>[15]</sup> 90 年代初，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剧增，曾经让美国人惊呼“日本购买美国”。但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开始强调外国在美国投资有助于弥补财政赤字以及贸易赤字所造成的经常项目差额，有利于达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sup>[16]</sup>

### 第三，关于美元地位。

如何估计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90 年代初“美国衰落论”的论据之一便是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后，美元地位和汇率不断下跌。当 1994 年和 1995 年头几个月美元兑日元和马克的汇率大幅度下跌时，人们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再一次表现出忧虑，有人甚至提出美元、日元和马克三种国际货币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但是，有的专家根据新资料说明，“美元地位虽然在下降，但是与任何其他货币相比，无论作为计值货币、支付货币，还

是作为储备货币，美元仍占有绝对的优势。”例如，1994年美元仍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官方外汇储备的57.1%，而马克和日元仅分别占14.8%和8.1%。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比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持续的时间要长。<sup>[17]</sup>

第四，关于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

几年前，人们经常根据日本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超过美国的事实，来说明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随着“购买力平价”的概念在国际经济比较中受到重视，这一判断已受到怀疑。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商业部根据购买力平价的估算，1994年美国仍为世界首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6640美元，第二位是卢森堡的22830美元，以下依次为加拿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列支敦士登，日本(20200美元)、德国(16580美元)分别排第10和24位。<sup>[18]</sup>

中国的美国经济问题专家在估计9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经济发展状况时，提到的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并且大都认为美国同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在一些领域甚至扩大了。同时，也有学者强调指出，“不能单纯地以商业周期的某种经济变动来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问题，不能在经济周期不景气时就谈论‘经济衰落’，而在经济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时又说是‘经济复兴’，这种论证方法是不可取的。”<sup>[19]</sup>实际上，未来几年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可能回升。日欧的储蓄率都高于美国，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也相当高，又都处于深刻的经济结构性调整之中。因此，在下世纪初又一次出现日欧赶超美国的现象，并非不可想象。

## 二 综合评价尺度

90年代初一些著述论证美国的世界地位相对衰落时，最重要的依据是美国同日本、德国相比，经济竞争优势下降。那么，如果事实证明美国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拉大，能否说明

美国的世界地位上升了呢？笔者认为，观察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需要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尺度，包括纵向和横向的尺度及多重视角。

所谓纵向尺度，指的是将今天的美国同什么时候的美国相比。如果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相比（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曾经占到世界总产值的一半），美国的世界地位毫无疑问并且无可挽回地降低了，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这种比较解决不了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如果是同 80 年代初相比，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没有显著的波动，基本保持在 25% 左右，美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也没有明显变化。这两项指标都不足以说明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本文所探讨的，是同冷战刚刚结束时相比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

所谓横向尺度，指的是将美国同哪些国家相比。如果同日德两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相比，在冷战后的几年里美国的优势扩大了。同经济衰退的俄罗斯相比，优势的扩大更为明显。但是，当同中国、亚洲以至作为整体来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时，美国同它们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明显缩小了。近三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在 6% 上下，亚洲高达 8% 上下，而美国仅在 2.2% 左右浮动。<sup>[20]</sup>也可以说，冷战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仍然能保持世界总量的 1/4，靠的是日本和部分发达国家的低增长率，以及前苏联等地区的负增长。

所谓多重视角，指的是经济以外的其他衡量标准。一个国家的世界地位，最终当然是由它的国力来决定的，而国力的核心当然是经济实力。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实力同政治地位不相称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例如，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以来远大于中国，但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却小于中国。冷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远不如 80 年代后期，但它在亚太地区以至世界的政治地位却没有下降，甚至可能比 80 年代后期上升了。在观察美国世界地位

的变化时，经济指标（尤其是在冷战后这短短几年里的指标）和经济发展趋势，只能是主要依据之一。本文提出七项重要衡量指标，以期对美国的世界地位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估。

### （一）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除上文已经提及的主要具体指标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美国经济实力有着恒定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和地缘位置的优势为基础，国土辽阔，人口总数大而密度低，这些都是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在全球人口急剧膨胀同环境恶化、资源稀缺的矛盾日益激化时，美国这一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二是美国率先进入信息时代，由电脑技术和通信技术结合而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正在给美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信息集约化的领先地位，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扩大美国同其他国家在尖端科技领域（生物工程、医学、宇航、新材料等）的差距。

### （二）军事能力

冷战期间，即从 1945 年到 1989 年，美国军费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6%。美国在冷战后削减军费的幅度较大，从 1990 年的 3000 亿美元左右（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5.4%），<sup>[21]</sup> 削减到 1995 年的 2706 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3.7%）。<sup>[22]</sup> 美国国防部 1997 年 5 月 19 日公布的“防务战略报告”，提出要保证今后 10 年内维持目前每年军费 2500 亿美元的水平。<sup>[23]</sup> 如果这份“防务战略报告”的建议能够获得批准和实施，今后美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逐渐降到 3% 以下。但美国军费目前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是其北约盟国军费总和的近两倍，俄罗斯军费的三倍，中国军费的十几倍。

美军总兵力从 1989 年的 213 万人压缩到 1997 年的 145.7 万人，计划在 2001 年保持在 144.5 万人的规模。<sup>[24]</sup> 在美国军费、战

略核武器和兵力都有所削减的同时，它在海外的驻军也急剧减少。1987 年时美国在欧洲驻军达 32 万人，到 1995 年初时缩减到 10 万人。1992 年美军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撤出，但它在亚太地区驻军的缩减幅度不大，只从 12 万人减少到 10 万人，并将保持这一规模。<sup>[25]</sup>

美国军事技术的加速发展弥补了它在经费和兵力上的压缩。美国仍然重视核武器的作用，但已将武器发展的重点转到开发新一代的高技术常规武器，在军费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增加高技术武器研制的经费，加速发展隐形、定向能、智能、精密制导、空间系统、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sup>[26]</sup>冷战结束后，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付地区冲突的能力有所提高。

冷战后美国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的军事优势也许没有下降，但是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降低后，美国的超强军事能力对其他大国难有威慑之势，军事力量转化为政治和外交工具的作用下降了。

### （三）教育水平和人才流向

多年以来，“救救我们的学校”、“教育的末路”、“大学的危机”等等，在美国不绝于耳。目前美国教育的困境，集中于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和高等教育学费上涨过快这两个问题。在 90 年代，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缓解的迹象。教育状况能否改善，关乎美国下个世纪能否保持竞争能力。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布什自称要做“教育总统”，被传为笑柄。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决心推进教育改革，在 1997 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教育优先”。他主张制订全国教育标准，已引起广泛反响。但是克林顿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受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阻挠。宪法规定教育本质上应由州和地方政府管理，联邦政府只能起辅助作用，这对克林顿的改革形成体制上的牵制。预算平衡的压力，又使政府难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拨

款。<sup>[27]</sup>因此，美国教育想要夺回国际优势困难重重。

美国教育既有弊端，也有很大的变革余地。它的体制相对来说最开放，最灵活，最分散，最少干预，易于实现知识更新。否则很难解释，为何在国际上衡量学术成就重要标志的诺贝尔奖中，美国得主如此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贝尔物理奖和医学奖，美国人囊括了将近 1/2，经济学奖美国人竟拿走了 2/3。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先进的教育设施和研究手段，高度开放的社会环境，将国外科技优秀人才和各类专门人才源源不断地吸引到自己国土上，直到 90 年代依然如故。只要人才流动的这一方向不变，就很难得出美国经济和教育状况将持续衰落的结论。

#### （四）社会凝聚力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由不断涌入的新旧移民组成，种族、宗教、文化、政治必然是多元化的，但又有主流的族体、信仰和制度作为国家的核心和灵魂。美国主流社会的核心是所谓 WASP，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在历史上经历过严重考验，二战后的最大考验是 60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冲击。70 年代越南战争的失败和“水门事件”，则使美国政治领导的威望降到最低点。同苏联长达 40 多年的冷战虽然大大消耗了美国的资源，但却使全民族有了一个明确无比的战略目标、竞争对象和奋斗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说，同苏联的对抗和竞争维系甚至增强了美国的社会凝聚力。

苏联的迅速衰落和解体，使美国在确定国家目标时部分地失去了方向感。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挑战，日本的经济挑战和“资本入侵”，舆论界关于“中国威胁”的鼓噪，都代替不了过去苏联那样一种激发美国内聚力的作用。与此同时，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严重地侵蚀着美利坚大厦的根基。这些问题主要是：

——种族矛盾突出，反移民倾向抬头，多元文化对主流文化形

成强大挑战。60年代黑人运动取得的重大成果，体现在今日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种族平等的强大潮流相适应的“多元文化主义”，使公开表露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但种族间表面上的平等，无法掩盖社会权益上的不平等。同白人相比，黑人、其他少数族体和新移民是犯罪、暴力、执法不公、吸毒等社会痼疾的更大受害者。1992年5月的洛杉矶种族骚乱，1995年的辛普森审判，1995年10月黑人在华盛顿举行的大游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连续发生黑人教堂被蓄意焚毁事件，都凸现了美国种族分裂的深化。近年来白人保守势力又公然宣扬种族优越论，社会上掀起一股新的敌视和歧视移民的排外情绪。<sup>[28]</sup> 少数族体的自然增长率高于白人，加上以拉美人为主的新移民增加，到2050年前后，欧洲白人后裔将只占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使社会整合的任务更加复杂化。

面对社会离心力的加剧，面对各个种族集团关系的紧张乃至冲突，美国的主流社会日益公开地表示忧虑，并决意促进社会的整合。克林顿在1995年10月16日黑人大游行的当天发表演说，称种族分裂“正在撕碎美国的心”。<sup>[29]</sup> 他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最为强调的任务便是加强社会凝聚力，避免种族差别带来分裂。<sup>[30]</sup>

——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严重。近年来美国经济的持续上升并没有给中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显著的提高。在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变革中，出现了所谓“忧虑阶层”，其成员既包括20年来经济状况一直在下滑的最低收入者，也包括近况不佳的下层中产阶级人士。由于缺乏适应新经济形势的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报酬较低的服务性工作或者非全日制工作，始终没有分享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成果。有数字表明，1992年以来低收入层的实际工资一直在减少。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也只有微小的增长。

——犯罪率居高不下，恐怖组织猖獗。据联邦调查局统计，1995年同1991年相比，美国的犯罪率下降了10.5%，同1986年

相比下降了 3.7%，但是同 1986 年相比的暴力犯罪率增加了 10.8%。<sup>[31]</sup>形形色色的“民兵”组织和异端教派同政府对抗的事件几年来一再发生，引起人们对美国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关注。美国的高犯罪率和恐怖活动泛滥的社会根源是种族矛盾、贫富不均、毒品泛滥和精神危机，因此政府的治安措施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基本局面难以改观。

——核心家庭破裂，价值观失落。离婚率提高，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解体，对美国新一代的道德教育构成严重威胁。电视等传播媒体里充斥着暴力、色情和享乐无度的内容，腐蚀着青少年的灵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社会中“放纵的丰饶”（道德观念失落，物质欲望上升）表示深深的忧虑，担心长此以往，美国社会将失控，政治制度将不再具有吸引力。<sup>[32]</sup>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今天的美国是宽容和自由有余，训诫和自律不足。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新一代人更容易迷醉于以个人为中心的物质享受和低层次的“大众娱乐”，丧失对社会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当然，“美国精神”受到侵蚀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对自由放任的批评和保守思想的回潮也值得重视。

——政界丑闻不断，公众对政治领导人缺乏信任。冷战结束后的几次国会和总统选举投票率低落，虽然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说表现了美国公众对政治现状的失望和不满。在 1996 年大选后《新闻周刊》进行的调查中，只有 12% 的美国人表示对政府机构“相当信任”，而信任国会的仅为 8%。<sup>[33]</sup>不过，美国公众依然基本认可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和两党制，第三党难成气候。

社会凝聚力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指标。以上分析至少说明，冷战后美国的社会凝聚力没有增强，而是呈现削弱的趋势。

## （五）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及美国的形象

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

优势，反共意识形态的信条似乎得到验证。多党制议会民主—保障人权—言论自由—信息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物质繁荣—社会公正—民族团结，成为美国意识形态中一环紧扣一环的链条，其对立面则被描绘成前苏联式的一党专政—侵犯人权—思想僵化—信息封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物质匮乏—分配不公—民族歧视。苏联刚刚解体时，历史似乎“终结”，美国模式全面战胜苏联模式。

但是，冷战后短短几年的历史，就迫使美国以至世界各国的思想界对两极对立、非黑即白式的思维模式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反共意识形态尽管还有把中国作为攻击的主要靶子，但中国改革模式的生命力不能不令持传统反共观念的人们感到吃惊。东亚一些国家在保持经济繁荣的同时继续排斥西方式民主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升，西欧社会问题激化，一些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转型后经济停步不前，民族矛盾加深，也都不是冷战意识形态教条可以解释的现象。

对美国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过去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榜样的力量”，随着美国社会痼疾的加重，正在一步步丧失。美国著名评论家、《全球视点》通讯网主编加德尔斯说：“那些曾经称羡美国社会并憧憬其未来的亚洲和欧洲精英们，现在却拒绝美国的自由放任模式，而把它视为加剧社会和道德混乱的处方。在他们眼里，美国成了半个霸主，部分是大棒，部分是脆弱的芦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尖锐地批评道：“谁愿意在那样一个社会生活？孩子们持枪自相残杀，邻里没有安全感，老人遭遗弃，家庭分裂。传播媒体把所有权威拉下马，肆无忌惮地攻击领袖的人格，指责一切人，惟独不指责自己。”欧洲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的批评温和而深刻。他说，美国的错误在于把社会抛弃给了市场，造成了一个连家庭生活、社会凝聚力和文化都服从于资本主义强大动力的“市场社会”。“人们禁不住羡慕美国社会的弹性、适应性和竞争力，但也会对犯罪、暴